

運動、民族主義與國際政治角力：二十世紀以來的國際運動比賽

王秀惠

師大歷史系副教授

jwang@ntnu.edu.tw

2004 年亞洲盃足球賽由中國主辦，最後一場的決賽是由地主隊中國出戰日本。雙方對陣之前，熱情激昂的中國球迷就已經在日本隊出場的賽事，進行搗亂與辱罵，重燃二戰時中日之間的仇恨情緒。而在決賽過程中，中國球迷始終不滿裁判的判決，於是當日本隊最終贏得冠軍後，憤怒的球迷開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外聚眾暴動，焚燒日本國旗，甚至一度圍堵日本隊所乘坐的巴士。

由上可見運動比賽經常受到非關競賽本身的外來影響。究其歷史緣由，不難見到將運動與民族歷史恩怨、種族強弱等聯想在一起，變成另一種面貌的政治角力，而這種表現尤其在西方勢力興起後，更形加劇。近代西方的強勢，透過現代奧林匹克運動這類的國際比賽，開始對世界其他地區發揮影響力。1896 年，現代奧林匹克運動重新問世。由於該運動起源於權勢處於頂峰時期的歐洲，因此相關的比賽規則，自然反映了西方或歐洲的傳統。而對世界各地區而言，伴隨著西方或是外來勢力的刺激，運動競賽也隨著民族主義的催化而顯現出政治味。

一戰前夕，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加速了運動熱的旋風。體育記者不僅僅是相關事件的報導者，有時且不自覺地成為文化紀錄者。這股對運動明星的崇拜以及對其成就的集體認同，經過傳媒的催化，就成為民族特徵的基本要素。一戰結束以後，這種集體認同的行為被政治化。極權主義國家如德國或蘇聯，擅長於誘引和激勵大眾心理，因此特別欣賞體育活動的競爭刺激對一般民眾所帶來的興奮作用，而將運動與優秀民族或愛國士氣相互連結。

然而，以體育運動來振奮民族士氣，甚至創造出種族優越神話的行徑，其實並非極權統治的政權所特有。相信任何一個看過 2003 年亞洲棒球錦標賽新聞轉播的台灣觀眾都能證明這一點。該賽的前兩名可以獲選參加雅典奧運會。比賽於日本札幌舉行時，中華棒球隊在延長賽中最後以五比四驚險擊敗南韓，得以第二名之姿參加雅典奧運會，當時台灣街頭巷尾的歡呼聲，幾乎震耳欲聾，因為它代表外交受挫的台灣，在其他國際場合如運動場上不一定就不如人。至於陳詩欣和朱木炎為台灣獲得有史以來的兩面奧運金牌，其振奮台灣人心之情景，自無庸贅言。但有趣的是，當奧運大會升起中華台北的奧運旗幟時，陳詩欣歡然淚下的畫面，卻被南韓記者解讀為陳詩欣因台灣無法升起自己國家的國旗而感傷落淚。我們無法確知當時陳詩欣的本意為何，但可以確定的是南韓記者（或許也包含其人民）在重視體育賽事之餘，

是如何地將之與民族意識相互勾連。

由上看來，在運動競賽中，政治化的民族主義似乎已經化身成爲一種世俗信念，具有等同宗教般的魔力，操控著國家民族的命運。有的時候，這股信念有助於轉移國內政經、外交困境的焦點，或是可以修補種族、文化分歧所產生的社會裂痕，儘管那也許只是臨時性的效用。舉例來說，在世界盃足球賽中，有一支南美國家的球隊擊敗來自西歐的對手時，必然舉國歡騰、引以爲豪，而暫時忘卻國內政黨路線之爭或經濟通膨的苦難。更有甚者，運動競賽還能引發毗鄰而居的兩國之間，一夕翻臉。1969年宏都拉斯和薩爾瓦多的足球戰爭即是明證。固然兩國早已因邊界糾紛和移民問題而時有齟齬，但一場世界盃足球預賽，賽前因爲宏國球迷干擾薩國隊伍，導致薩國失利。一位傷心過度的薩國球迷自殺，遂引來全國球迷對宏國球隊在客場時的報復行動，最終兩國出動陸空部隊，兵戎相見，造成兩、三千人喪命。

I. 運動賽會與民族主義

下文將運動比賽區分爲世界性和區域性的兩類賽會，分別深入說明運動與民族主義和國際政治角力的關係。

(一)、奧運會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從一開始就隱含著政治色彩，並且成爲展現民族主義的先鋒。1912年斯德哥爾摩奧運會中，參賽各方已經出現了民族競爭的激情。此後，受到一次大戰的影響，1916年的奧運會被取消。1924年奧林匹克運動重新恢復而在巴黎舉辦時，十二年前各個國家民族間的競爭情結仍然絲毫未減，但來自前中歐體育強國德國和新興的蘇聯運動員則被禁止參賽。前者後來獲准參加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後者則直到二戰結束後才得以與賽。在這段被禁的期間，蘇聯則模仿奧運會設計了爲無產階級而辦的「國際紅色體育運動會」。

不過相較於上者，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才是毫不掩飾其政治色彩。自從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來，德國統治階層提倡的種族優越意識，顯然與奧林匹克所宣稱的國際和平與平等精神背道而馳。美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曾號召抵制這屆奧運會，他們認爲納粹的種族政策違背了奧林匹克章程。此一抵制最終以妥協的方式解決：當時美國奧會主席布倫戴奇同意德國的主張，讓美國的猶太運動員不參賽，犧牲少數人，而成全這屆奧會得以繼續舉辦。柏林奧運會也是首次媒體特別關注的奧運會，在各項傳謀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電影製片人勒尼·里芬斯塔爾。她在其傑作《奧林匹克》這部影片中捕捉了納粹運動會上的莊嚴肅穆與光輝時刻，其中頗具政治宣傳的意義。

當時另一個法西斯國家—日本—也公然宣揚民族優越意識。日本原先將要主辦1940年奧運會。在現代奧林匹克史上，這是西方以外的國家首次獲得承辦權。但是日本軍國主義份子先後於1931年和1937年在滿洲和中國北部進行侵略行動，分別發動「九一八」與「七七」事變，激起國際社會的強烈指責而反對其主辦奧運。但日本堅持其軍事擴張，而寧願放棄承辦奧運會，這才使得國際奧委會避開了一場可能產生的尷尬危機。

二戰之後，冷戰的意識型態、殖民地解放風潮和第三世界的興起，這些因素都刺激了重新解釋奧運精神之必要，因而給奧運管理體系帶來新的活力，開始接納許多新的會員國。如

自 1951 年起，奧林匹克運動會接納了蘇聯及其東歐週邊國家。同時在東西對峙的階段中，美蘇兩大集團運動員之間的賽會也成了衡量冷戰均勢的一個重要尺度。計算各方所得獎牌數在雙方陣營間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因此在這一時期，雙方都各自培養了奧運頂尖好手，凸顯了田徑賽場仍然潛藏著政治角力的現象。

二戰前，奧運會偶爾會出現以排斥某國運動員參賽的手法，從而在政治上對該國發出責難之聲，最常見的就是拒絕蘇聯選手與賽。一旦冷戰意識被引入奧運會，抵制或反抵制的事件就更常發生。1980 年，美國為反對蘇聯入侵阿富汗，領導抵制莫斯科奧運會的比賽。有趣的是，因為阿富汗也是回教陣營的一份子，阿拉伯世界這回竟然聲援美國而與以色列站在同一邊；當時以色列和美國的緊密關係導致以色列也參加了抵制。結果 1980 年莫斯科奧運會最終僅有 81 個國家參加，高達 62 個國家抵制，形成了現代奧運史上最大的政治抵制運動。不過當 1984 年輪到由美國洛杉磯主辦奧運會，這回蘇聯也立刻以牙還牙，回敬以另一波的抵制活動。

扣除政治因素外，意識形態或民族主義的感情因素也常影響到評分。有時裁判顯然因自己的民族主義傾向而影響了裁決。1988 年漢城奧運會上這種現象引起了極大憤慨。體操比賽中出現了明顯的評判不公情形，裁判被戲稱為「黑手黨裁判」(Judging Mafia)。此外，奧運內部的調查顯示有兩名拳擊裁判，賽前曾接受地主南韓隊的邀請賄賂，結果他們把金牌判給了比賽中實力明顯不如美國選手的一名南韓運動員。為此，這兩名裁判被終生取消裁判資格。

奧運會在政治方面最富戲劇性、也最悲慘的一幕，是巴勒斯坦激進份子在 1972 年慕尼黑奧運會上的行動。最近的電影「慕尼黑」即是以此為故事背景。當時為了引起全世界對巴勒斯坦政治問題的關注，武裝的巴勒斯坦激進份子潛入奧運村，將以色列隊運動員扣作人質。德國和以色列都拒絕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德國狙擊手在以色列政府同意下，試圖制止這群激進份子挾持人質登機。雙方槍戰的過程中，造成以色列運動員和三名巴勒斯坦綁匪死亡，以悲劇收場，這種結果完全背離奧運會所訴求的公平競爭與非武力的和平意義。

(二)、區域性國際運動會

隨著世界政治和文化加速地區化，各地出現了一些模仿奧運會的區域性運動會，如亞運會、地中海地區運動會、泛美運動會、非洲運動會等。亞運會是由印度第一任總理尼赫魯所推動，隸屬於國際奧委會之下。它於 1954 年首次舉辦，算是真正的全亞洲人運動會。但是在 1963 年，印尼將承辦次年的亞運會，由於其反美親共的立場，並未邀請以色列和中華民國隊，結果奧委會取消了他們的承辦權，此舉還導致印尼首都發生騷亂。國際奧委會因而暫停印尼奧委會職權。當時的印尼總統蘇卡諾原本打算將本次賽事改名為「新生力量運動會」，決定即使在無法得到國際奧委會支持的情況，仍要繼續舉行。奧委會則宣佈參加此次比賽的運動員，將被取消其下屆奧運會資格，以此作為威脅應聲阻止。即使時至今日，亞運會仍然是國際政治和外交角力的舞台。這種戲碼，大概台灣的運動迷都不會生疏；尤其是關乎台灣隊名的更動困擾，總是連年不時在上演。

II. 運動比賽與西方殖民主義的影響

國際奧運會和區域性奧運會的比賽項目，都包含源於歐洲或美國的運動項目，這一事實當然是十九和二十世紀殖民過程所遺留的產物，並繼續影響至今。殖民者對體育運動的傳播——就如他們的文學與藝術一樣，是文化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面向。由於英國和美國(美國尤甚)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的帝國主義勢力，他們的體育項目遂風行草偃地流傳開來。雖然日本從未直接被他國殖民統治，但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日本還是受到英、美的商業滲透。因此，典型的美國項目—棒球和典型的英國項目—板球一起輸入日本。不過，後來棒球超越了板球，在日本高中生和大學生中更為風行。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現代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二是戰後日本對美國優勢的瞭解與崇拜，這些因素都有助於使棒球賽更富吸引力，也可見出體育活動的流傳其實是取決於輸出這些運動的國家其相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勢力，而非關任何原有文化的傾向。至於足球則是殖民環境下傳播體育運動的另一個例子。它最初由英國士兵、傳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傳播到世界各地，隨後在其他歐洲國家殖民地也流行起來，並像板球般地融入當地住民的生活，只是足球參與的人數與階級更廣，因此影響的規模更大。

除了利用教育機構在帝國內培養英式競賽精神之外，英國人還引進了另一種深具活力的機制：運動俱樂部。雖然殖民地原住者之上層人物經常模仿殖民者建立同樣排外的俱樂部。但這些團體日後卻成了滋生反殖民情緒的溫床，並且在殖民地解放和建國之初，成為一些新獨立亞非國家奧委會的核心。

雖然絕大多數體育運動的傳播模式都是從殖民者傳向被殖民者，但有些形式的運動和比賽則是反向傳播。例如，人們所熟悉的馬球運動早在英國建立東印度公司之前就已在中亞和印度次大陸出現。當聖公會傳教士向印度上層人物傳播板球時，馬球則由返鄉回國的英國軍官傳入英國。如今人們一提到馬球，經常將之與皇親貴族或富翁連上等號，視為有錢有勢者的運動。又如柔道則是另一個明顯被西方人接受的原住者運動。它是十九世紀末由日本大師簡化舊傳統的武術而發展出來，1945年日本戰敗後開始為歐美各國人士所熟知，並在他們占領日本後傳回國內。雖然日本人仍在國際柔道比賽中佔有優勢，但西方選手已逐漸挑戰這個霸權。

運動比賽因為有輸有贏，不免具有無法捉摸、難以預料的特徵，而正是這種特徵影響了其在歷史發展中的戲劇性。1945年之後的運動史，充滿了第三世界的代表隊戰勝其西方對手的事例。諷刺的是，這些比賽最初卻是由西方所引進，並以之作為殖民統治和文化支配的工具。如世界盃足球賽上，拉美和其他非歐洲足球隊（如非洲隊）打敗歐洲隊的戰績，不會少於它們被歐洲隊打敗的景況。這種體育比賽的勝利常常會加強得勝者的自豪，造成政治、經濟或外交領域少見的欣喜。有人認為運動比賽場上，被視為政治弱國的隊伍能夠獲勝的事例，其實是有助於維持國際關係的和諧。

由於參賽者及其政府和民眾都認為比賽成績的好壞與國際地位或地緣政治有著密切關係，因此，從1936年德國柏林奧運會納粹提倡優生學開始，有些國家從上而下，帶頭鼓勵利用科學創造優秀運動員。這種想法其實並不令人訝異，只是各國使用的所謂科學方法和藥物卻愈趨複雜。例如北韓嘗試在三、四歲的幼童中尋找富有潛力的運動員，然後由國家負責他

們的培訓，以保證發揮其潛能。有些國家的教練和父母則急於採用各式各樣的科學研究成果，支持有潛力與抱負的運動員發揮其才能，冀望他們能為國內的資助者帶回奧運金牌和榮耀。如此一來，卻也衍生出某些走火入魔的行徑。1976年蒙特婁奧運會甚至出現了提高比賽成績的回輸技術，其作法是讓運動員在高海拔地區訓練以增加紅血球的含氧量，然後抽取運動員一部分血液，將它保存到賽前最後一刻再重新輸入體內，以提高運動員的耐力。雖然回輸血液並不需添加外來藥物，但是此舉仍被視為違背奧運精神，因為它會造成選手不自然、不公平的優勢。

結語

中國即將在2008年舉辦國際奧運，而像中國這具有高度政治目標的國家，必然會利用奧運會來實現其躍升國際大國的目的，顯現其在體育運動及其他領域的傑出成就。而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歐美和日本等國，也會繼續利用奧運會來展示其民主體制與自由企業的優越性。至於其他國家更不會放棄這種在國際上露臉的機會，畢竟運動場上是傳統政經、外交場合之外，另一個展現民族主義與國際政治角力的最佳舞台。